

20 世纪 90 年代的 南北经济关系及未来展望

郭建泉

一、20 世纪 90 年代南北 经济关系的国际大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由于冷战和两极格局的结束,世界政治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虽然多极化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但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国际竞争从原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竞争逐渐转向以经济和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经济呈现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两大基本特征,处于加速发展的态势。发达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虽然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没有改变,但是,美国经济由于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而欧盟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有待于进一步增强;日本经济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长期低迷徘徊,一时难以承担大国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极不平衡,有些维持了较快增长,有些则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不前,还有些国家的经济境况更差。

在这种背景下,90 年代的南北关系趋于缓和,双方在国际经贸领域均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和灵活的做法,在继续开展经济竞争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合作、协商与对话,其总的态势是:合作之中有竞争,斗争之中有妥协;斗争趋于缓和,合作和对话成为主流;竞争和斗争促使双方合作、协商和对话的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水平逐渐提高。

二、20 世纪 90 年代南北经济关系的特点

1. 南北经济差距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南北双方原本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距。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在努力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积极地谋求缩小南北经济差距。然而事与愿违的是,90 年代世界经济加速发展,而南北经济差距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这尤其体现在科技水平的差距上。冷战结束以后,科技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显示出日益重要的作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加大了对科技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推动了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经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孕育并发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在这方面美国表现尤为突出。从里根政府到克林顿政府,无不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进行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在 90 年代推动了美国经济持续较快的增长,形成和发展了所谓的“新经济”,使新一轮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率先在美国爆发。欧盟则通过深化内部经济一体化,加速实现货币联盟,努力实现科技革命,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也都在试图抓住科技革命的契机,进行新一轮的经济结构

调整,以便在 21 世纪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信息革命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爆发,标志着这些国家率先步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

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控制下,遭受 90 年代巨大的全球化浪潮冲击,由于普遍缺乏资金、人才和资源特别是先进的科技,致使有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有的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还有一些极端不发达国家不得不在饥饿中挣扎。据统计,目前发展中国家中尚有一半人口从未打过电话,整个非洲的电话线路加起来,才抵得上纽约曼哈顿岛电话线的长度;发达国家平均 6.8 个人中就有 1 人上网,发展中国家平均 440 人中才有 1 名网络用户。经济信息化程度的高低已经形成南北经济最主要的差距之一,南北双方为争夺科技主动权的斗争日益激烈。经济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技术、人才和资金优势,得以不断地推动科技创新,始终占领科技发展的上游;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已经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但由于人才缺乏、资金不足以及自身工业化尚未完成等方面的原因,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缓慢,这使得南北科技差距不断扩大。

科技发展并没有给世界各国和所有人带来均等的机会和财富,而是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南北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1998 年,瑞士以人均年收入高达 4 万美元,保持世界首富之位,而排在最后的埃塞俄比亚人均年收入仅 100 美元;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已从 1983 年的 43 倍扩大到目前的 60 多倍。世界经济在不断发展,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也在逐年上升。90 年代的 10 年间,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由 36 个增加到 48 个。目前全世界 60 亿人口中每天支出不足 2 美元的有 28 亿人,不足 1 美元的有 10 亿人;8% 的儿童在 5 岁前夭折,9% 的学龄男童和 14% 的学龄女童失学;贫困使这些人口在政治上得不到应有的权利,地位低下,在疾病肆虐、经济危机、家庭暴力和自然灾害面前更加脆弱。世纪之交,如何消除贫困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巨大问题。

2. 南北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

1990 年代的国际金融领域是极其不平静的,金融危机频繁发生:1991-1992 年的“英镑危机”,1994-1995 年墨西哥的“比索危机”,1999 年初巴西的“雷亚尔风暴”;尤其是在 1997-1998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一度演变成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致使持续高速增长东南亚经济陷入衰退的深渊,许多国家首次出现了十几年来没有的负增长,有的因此发生社会动乱,有的还引发了政治危机,危机的严重影响最后甚至波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其影响之广、程度之深、危害

之重,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些危机的共同点是,危机往往爆发在发展中国家,而制造危机的罪魁祸首又往往来自经济发达国家;其最直接结果是严重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危害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安全,同时却有利于经济发达国家在危机中渔利;危机越频繁,发展中国家损失就越大,而经济发达国家从中渔利的机会就越多。

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南北双方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矛盾升级和斗争激化的结果,它暴露了南北双方对当前国际金融问题认识的分歧,其焦点主要集中于如何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制度。由于这些制度是在经济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的,经济发达国家为了获取既得甚至是更大的利益必然竭力维护现行体制,并努力促使其向自己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尽管对现行不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国际金融体系表示不满,但由于自身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的原因,没有能力改变它。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那些危机受害国家非常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金融支持,但由于IMF的援助往往附带许多附加条件,条件非常苛刻,带有浓厚的自由市场经济色彩,反映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意志,对深受危机折磨的发展中国家反而不利,危机受害国家如果按照IMF的条件改革,轻者会导致经济紧缩,重者会加剧金融动荡,甚至发生社会动荡。

又如,现今的国际金融制度有利于经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投机,同时却削弱了发展中国家防范风险和宏观调控的能力。特别是在90年代,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化,信息技术革命突飞猛进,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技术、物质基础和广阔的活动空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吸引外资发展市场经济,由于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体系不完善和金融监管乏力等不利因素,特别是有的国家超前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和金融机构私有化,在健康的国内金融体系形成之前大举开放金融市场,形成了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符的金融体系。经济发达国家以各种基金为代表的国际游资凭借其专业技术、人才优势和经济实力,选择那些经济政策失误、汇率失衡且处于信息劣势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目标,发动金融危机,获取巨额利润。

3. 世界贸易走向“有序”,南北贸易合作跨上了新台阶。

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国际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南北经济矛盾虽然时有发生,有时甚至趋于激化,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双方经贸交往的日益扩大,南北之间经贸合作得到了较快地发展,致使合作多于斗争,妥协多于对抗,通过斗争进一步加深了合作。比如,在长达7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一些南方国家逐渐觉醒,自始至终活跃在谈判台上,强烈呼吁把那些限制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的农业、纺织品和灰色区域措施等先于服务业等发达国家希望讨论的问题而予以优先解决,并为之间发达国家开展了积极的斗争。可以说,乌拉圭回合关于农业贸易与服务、市场准入等等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是南北双方斗争、妥协并达成合作的结果。

1995年乌拉圭回合协议生效,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将全球96%的贸易额纳入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标志着世界贸易走向“有序”,国际贸易体制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里程。由于世贸组织内部存在“南北”矛盾,它确定的游戏规则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巩固和扩大

了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优势,更多地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因此,就总体而言,当前的世界贸易体制对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并没有给予充分的保障。但是,随着多边贸易体系发展中成员的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不懈努力下,WTO在其规则中给予发展中成员更多的灵活性和特殊权利,对发展中国家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减少全球化的冲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使我们认识到,以多边贸易体系为核心的世贸组织,实质为南北开展协商和对话提供了一个更为正式和有效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南北双方就具体贸易问题既可以进行争论,然后达成共识,又可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适应国际分工的最新发展趋势,做合理的妥协和让步,使双方共同获益。比如,WTO的所有条款、协议都是各成员之间通过谈判,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经过各国政府和立法部门批准后,才在成员间实施的;又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也非常鼓励其成员就贸易争端,通过政府之间的双边磋商,寻求符合世贸组织规定、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因此,世界贸易纳入多边贸易体系的领域越多、范围越广,标志着南北对话和协商的基础越强。在这个意义上,WTO的成立不仅代表了世界贸易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意味着南北之间的协商和对话有了新的起点。

4. 南北区域经济集团化取得了新的发展,南北经济合作加速深化。

南北双方冲破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共同组建区域经济集团化组织,这是90年代出现的一种新现象。第一个南北区域经济集团化组织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于1994年开始启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它将于2005年建成自由贸易区。这是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它的启动标志着南北区域经济集团化有了新发展。此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形成,目标是2010年实现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2020年发展中国家也完全取消关税,建立自由贸易。另外,东盟与新西兰、澳大利亚联合谋求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拉美的南方共同市场共同筹建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南非、印度、澳大利亚等7国在1995年签署关于建立环印度洋经济圈计划的联合声明。这些都进一步加强了南北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趋势。

南北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新发展,给予了参加这些组织的发展中国家更多发展的机会,使它们能够获得较多的投资和技术转让,使其经济能够快速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逐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这并不等于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恩赐”或“施舍”,而是南北双方在经济过程中的共同要求和经济互补的需要,也是南北经济协商、对话进而取得共识的结果。因此,南北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新发展,不仅意味着南北经济合作已经走上新的阶段,而且将不断推动南北经济合作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5. 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和环保问题等随时可能激化南北矛盾。

90年代,南北双方在粮食、能源、环保等许多领域内积累了诸多矛盾和分歧,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其中多数是潜在的,一旦条件适宜就会爆发出来,使南北经济斗争激化。以粮食问题为例,由于世界环境不断恶化,自然资源迅速减少,而人口急剧膨胀,粮食供求趋于紧张,致使一些极不发达国家如南部非洲不得不在饥饿中挣扎;乌拉圭回合关于农

产品协定的达成后,世界农产品价格面临上涨压力,无疑使这些国家雪上加霜。再如,在石油问题上,如何解决石油供应困难,防止石油价格暴涨暴跌,成为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然而2000年开始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对快速增长的世界经济构成威胁,对此,发达国家要求欧佩克增产,而石油输出国由于生产能力有限,增产幅度不大,仍然难以满足世界各国对石油不断增长的需求,致使南北在石油问题上的矛盾一时难以调和。

三、南北经济关系展望

1. 南北差距可能继续拉大,但国际社会谋求缩小这一差距的努力不会停止。

90年代,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少数经济发达国家能够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野蛮地推行强权政治和单极世界战略,使人类社会寻求国际政治多极化、民主化的进程受到挫折;经济上,除了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外,欧盟由于经济增长缓慢,使问世时间不长的欧元持续贬值;日本经济则因为泡沫经济的破灭,长期低迷,积重难返;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产业升级和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沉重压力,拉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部分国家被边缘化,沦为经济全球化的牺牲品。

进入21世纪后,由于经济发达国家在科技、人才、资金和资源上的优势依然存在并且不断得到加强,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劣势在汹涌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有可能进一步被固化,尤其会使一些极不发达国家处于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境地,因而在新世纪南北经济差距有可能被继续拉大。对此,国际社会已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2000年9月,16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聚会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共商缩小南北经济差距、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计。继1980和1990年论及贫困问题之后,世界银行在2000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再度触及这个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向贫困宣战。尽管这些努力尚未取得突破性的实质进展,但是,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人们更多地期盼,经过南北双方的共同努力,国际社会可以总结世界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消除贫困,减小南北差距,描绘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蓝图,使21世纪成为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纪。

2. 面对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仍可有所作为。

当前,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知识经济已现端倪。知识经济的兴起既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挑战,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发展中国家只要采取适当的、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在科技上,依据本国实际,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也可能独辟蹊径,取得一些成效,使科技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在这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表现十分突出。90年代以来,印度根据自身人力资源丰富而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的实际情况,在高新技术领域加大了培育软件产业和培养软件人才的力度,使印度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软件生产国和出口国以及世界最主要的软件人才输出基地之一。据统计,近年来印度软件出口每年以50%以上的速度大幅度增长,90%以上的产品输往美国和欧洲等国外市场,今年印度软件产品的出口总额预计将达到57亿美元。据有关专家预测,8年后

印度的信息技术产品的年出口总额可以达到500亿美元,占印度出口总额的33%,创造220万个就业机会,并把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到两位数。

由此可见,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应当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符合本国经济发展条件的政策,努力增强创新能力,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在世界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规避灾害和风险,充分享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静态和动态利益,加快自身经济发展。

3. 南北经济合作将在斗争中继续走向深入,其焦点从一般性经济问题转向打破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新秩序。

新的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强,各国经济间的依赖性日趋加深,整个世界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南北双方已经连成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对方的发展构成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不断加强协商、对话与合作,才能促进各方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同时,要消除贫困,缩小南北差距,使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是改革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建立公正合理的、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的经济新秩序。比如,南北将围绕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建展开更加激烈的斗争。目前,围绕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和重建问题,不仅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各自不同的立场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发达国家之间也因考虑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发表了不同的主张。由于世界各国的出发点不尽相同,经济发达国家之间在争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领导权,而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论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对国际资本流动实施控制,因而矛盾重重。就目前情况看,要想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恐怕在21世纪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尚无可能,充其量只能在现有体制上进行改良。又比如,步入21世纪后,随着世贸组织成员的不断增多,涵盖领域的逐渐扩大和内容的日益丰富以及南北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加强,南北之间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合作将会不断加强和深化。

南北加强合作不等于没有斗争。新的世纪,南北斗争将会进一步激化,合作也会走向深入,斗争又将促成进一步的合作。然而,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方面采取了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立场,客观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与发达国家也存在矛盾,因此,可以断言,围绕争夺制定全球化规则主导权的斗争将是激烈的,国际社会关于建立公正合理、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和发展的经济新秩序的理想是美好的,其历程也将是漫长而曲折的。

注释:

《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0-08-01。

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人民日报》,2000-07-12。

(作者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北京 100085
武汉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陈永清)